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学 术 史 从 书

郭双林 著

---

# 西潮激荡下的 晚清地理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郭双林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5

(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301-04508-5

I. 西… II. 郭… III. 地理学史-中国-清后期 IV. K9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306 号

**书 名:**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

著作责任者: 郭双林 著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508-5/K·028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30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50 元(精)

双林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思路是明确的。他不囿于地理学本身很专门的问题,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始终注意把握这样三个原则:一、把晚清地理学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晚清地理学的发展变化与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离开了当时的现实,就不可能弄清楚地理学在晚清为什么发生变化,就不可能阐明地理学在当时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二、把握晚清西方文化传播、民族危机与地理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文化传播和民族危机使传统地理学发生了急剧变化,而地理学的发展变化也推动了民族救亡运动,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引起一些传统观念的变化,发挥了其社会文化功能。三、既要注意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地理学所具有的特点。中国传统地理学有自己发展的特点,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地理学虽发生变化,但并没有丢掉其民族特点,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某种理论或范式来硬套。当然需要注意的原则不仅是以上几点,但它们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也需要了解、吸收外国有益的观点、方法,但不能简单搬来硬套,更不应该盲目地跟在别人后边走,唯洋是尚。

晚清地理学的研究虽有一定成绩,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系统全面的研究尤为欠缺。少有依傍,自会增加研究上的难度,要花费更多的摸索的功夫。双林在研究过程中,除尽量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外,力求在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着重考察了晚清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并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即:一、嘉庆、道光之际,传统地理学开始出现某些新的发展趋势;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播,传统地理学从研究重心到研究范围以及方法,都开始发生变化;三、同治、光绪年间,传统地理学的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四、光绪、宣统年间,即20世纪初年,传统地理学基本上完成了向近代地理学

## 序

郭双林同志研究晚清地理学的著作即将出版,深感兴慰!

这部书稿,断断续续历经 15 个年头。还在 1984 年,双林考进河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在导师胡思庸教授的鼓励下,即选择了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作为研究的课题。1990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最终还是选定了地理学方面的。不过研究的时段从鸦片战争延伸到清王朝覆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晚清”。时间跨度延长,内容也相当繁复,需要读的书多了,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多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开来。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影响下,晚清地理学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变化不仅限于地理学本身,而且相应传播了新思想,改变了一些陈腐的传统观念,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等。因此,对于晚清地理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都是有意义的。

的转变,其标志是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大学地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新式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研究刊物的创办。这一阶段划分是否完全准确,认为20世纪初传统地理学基本完成了向近代地理学转变等问题,都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学术研究要创新,需要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为一家之言,对推动晚清地理学研究,当会有助益的。

还需要提起的是,书中还着重探讨了晚清地理学对近代社会文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晚清地理学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引起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诸如天地观、中国中心观、夷夏观、时局观、国情观等。传统的方如棋、天运地处观念逐渐被地圆如球及日心地动观所取代,从而也打破了中国中心观念。而随着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又引发了对风水迷信的批判,动摇了传统风水观念。科学和迷信是对立的,只有提倡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才能破除迷信思想。晚清地理学的发展,对风水迷信所起的冲击作用,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龚书铎

1999年12月26日

## 导 言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地理学即已成为一门与天文学相并立的学问。秦汉以后,尽管中国社会战乱迭起,分合不定,但地理学却始终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不似欧洲的地理学,在中世纪中断发展一千多年。这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和中国相比。”<sup>[1]</sup>就笔者看来,当时中国传统地理学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先于西方:

(一)以实地考察为主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许多地理学者,如张騫、班超、法显、玄奘、郑和等人本身就是旅行家、探险家,其他一些人如颜真卿、沈括、于钦等,虽非专门旅行家,但也很注意实地考察,他们对于沧海桑田的认识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的。“沧海桑田”一语,晋代葛洪在所著《神仙传》中就提了出来,但无科学论证。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在

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顶发现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是沧桑变化的痕迹,遂写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指出该山“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并勒石以志之。北宋沈括在太行山东麓亦有相同发现,并断言此地乃“昔之海滨”。元代于钦在山东亦为葛洪的“沧海桑田”一语找到了证据。<sup>[2]</sup>一些人虽无外出考察的机会,却也非常注意吸收他人的考察成果。如唐代的贾耽,“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言,讯其山川土地之终结”(《旧唐书·贾耽传》)。至于其“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一语,更被历代地理学者奉为座右铭。

(二)完整的著述体例。中国传统地理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留下了数量极大的著作,而且门类齐全。据李约瑟统计,中国地理学著作起码包括古代著作和正史、人类地理学、对南部地区的地理描述、对外国的地理描述、旅行记、水文地理书籍、对海岸的地理描述、地方志(包括州郡志、名山志、城市和宫殿)、地理方面的类书等九种。<sup>[3]</sup>每类著作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方法和体例。如《禹贡》之于山经,《水经注》之于水道志,《汉书·地理志》之于疆域志,等等,均起到了使其模式化的作用。

(三)系统的制图理论。中国传统制图学在先秦时期出现,到秦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及驻军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到晋朝时裴秀进而提出了传统制图学的系统理论:“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晋书·裴秀传》)。此即著名的“制图六体”。其中虽未涉及经纬线及地图投影方法,但有关制图的主要原则都已论及。这一理论指导中国制图学发展达一千七百多年。

(四)朴素的世界观。在东西方地理学史上,都曾存在过朴素

的世界观与宗教寰宇观的对立,但在中世纪,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是荒诞的宗教寰宇观,当时欧洲广泛流行的世界地图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地图。在中国,虽然当时流行的地图只是一些“华夷图”、“天下图”、“广輿图”之类,但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朴素的中国中心观。<sup>[4]</sup>中国地理学史上惟一的宗教寰宇观是佛教的四洲观,虽然其在当时影响甚大,但始终未能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当然,也应该承认,由于多重因素,中国传统地理学虽然没有经过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时期,但也没有经过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时代。当欧洲地理学像被灌注“神力”<sup>[5]</sup>一般,摆脱宗教的束缚,冲出中世纪,迅速向前跃进时,中国传统地理学仍在不断地、同时也是缓慢地向前发展。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曾预示着世界地理学史上一个大发现时代的萌动,它使中国人的视野从亚洲东部扩展至非洲东海岸,并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下南洋”铺平了道路,但因其远航的目的主要是“宣示威德”、“给赐其君长”、“使诸邦咸听命”,不仅没有带来商业利益,反而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结果这一壮举竟被作为一项弊政而革除。一个躁动于母腹的婴儿竟遭扼杀。半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先后到达好望角(狄亚士,1486年)、美洲(哥伦布,1492年)和印度(达·伽马,1498年),此即欧洲历史上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中国人没有能够去发现欧洲,现在只有等待着被欧洲人来发现。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出现了东西方地理学接触、融合的机会,从而为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584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应明朝岭西按察使王忬的要求将自己悬挂的西文世界地图译为中文。以后利氏又多次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绘制、增订世界地图。随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熊三拔、蒋友仁等均曾

绘制地图,有的还就图立说,编辑成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艾儒略编著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撰写的《坤輿图说》,二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状况。此外,龙华民和阳玛诺还曾合制一个地球仪。

从1707年开始,在康熙皇帝的亲自主持下,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率领中国测量人员运用三角测量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并于1718年绘制成《皇輿全图》。这是我国运用近代测量方法经过实地测量而绘成的第一幅详细的全国地图。当时天山南北二路因处在准部和回部叛军统治之下,所以此图往西只绘至哈密。乾隆中期平定新疆叛乱后,又派明安图、何国宗等到新疆等地测量,在此基础上对《皇輿全图》进行了修订,增绘了所缺新疆、西藏等部分,制成《乾隆内府铜板地图》。通过以上活动,西方地理学知识,包括地圆说、地球五带说、五大洲说、太阳中心说以及三角测量方法传入中国。

同时,在实学思潮的濡染下,加之西方地理学的影响,相继出现了徐霞客、顾炎武、刘献廷、梁份和孙兰等一批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实地考察、并力图探讨各种地理现象成因的地理学者。其中一些人还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刘献廷就曾说:方輿之书不仅要记载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等人事现象,而且应究“天地之故”<sup>[6]</sup>,即探讨自然现象的规律。与其同时的孙兰则对前人“变盈流谦”的说法予以新的解释:“流久则损,损久则变,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故曰变盈而流谦。”他不仅认识到侵蚀和堆积是地形发育中的两个主要方面,而且认识到地形发育的渐变和突变两种形式,以及导致以上变化的两种因素:“变盈流谦,其变之道有可异者,有因时而变,有因人而变,有因变而变者。因时而变者,有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洪流下注,山石崩从,久久不穷,则高下易位。因人而变者,

如凿山通道,排河入淮,雍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应,地道顿异。因变而变者,如土雍山崩,地震川竭,忽然异形,山川改观。如此之类,亦为变盈而流谦。”<sup>[7]</sup>这些新颖的主张和解释,均迸发着科学的思想火花。

中国传统地理学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但是,由于雍正年间禁教政策的实施,自明末以来的西方地理学东传过程基本中断。《乾隆内府舆图》绘成后,更被统治者视为枕中鸿宝,藏之内府,外人不得观览。至于正在兴起的这股清新的地理学研究之风,也逐渐被以诂经读史为目的的古地理学研究所取代。“乾嘉以还,此学(指古地理学)益精,已几家喻户晓,述作之盛,旷代未有。学者幸际昌时,掇拾绪余,即可擅专家而侈论撰。”<sup>[8]</sup>而且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内地,对边疆地区,特别是西藏和蒙古地区很少涉及。所以,以诂经读史为基本目的,以内地十八行省为基本范围,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是乾嘉年间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基本特点。

嘉道之际是清代学术的转换期,反映到地理学上,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这时又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同时西方地理学也开始再次东传,东西方地理学经过相互接触、吸收、融合,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的诞生。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道咸年间(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同光年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和光宣年间(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年),时间大约九十年。这一过程虽然不算太短,但由于准备不足,环境恶劣,中国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形成之后显得非常嫩弱,以致今天仍有一些人不愿承认它已经诞生。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形成,无论其存在多少不足,都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产生了重

大影响。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虽不似历史学、历史地理学那么引人注目,却也不算冷落;至于成果,不仅有许多论文专著面世,而且有不少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平。不过,若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研究中国地理学史的专著往往只写到明末清初,极个别著作涉及到晚清时期,亦均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关于晚清地理学史的文章也不少,但亦只限于对某些人物如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畲、杨守敬、邹代钧、张相文等人及其著作进行个案研究,缺乏系统的考察。因此就出现一些由于不了解当时学术风尚而导致的主观臆测性错误,如时下人们对林则徐的《四洲志》是译是著、“四州”之名来源于佛教典籍还是西方的论述,龚自珍、魏源“边防论”与防止沙俄侵略扩张的关系,梁启超介绍的是孟德斯鸠的还是黑格尔和巴克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只有严复还是也有其他人在当时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等等。本书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而不是从科学史或地理学史的角度),对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当时的的发展、变化,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的产生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做一系统考察,以便弄清地理学在晚清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所处的地位,以便更好地把握民族文化在晚清的发展脉络。因此,如果从方法上讲,本书注重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晚清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进行考释。有些问题如果从科学史、地理学史的角度看非常重要,但在本书中却一带而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注意具体问题。

在时间断限上,本书上起嘉道之际(19世纪20年代),下迄清朝灭亡(20世纪初年)。之所以把上限定在嘉道之际,是因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在此时又一次出现某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后来非但没有中途夭折,反而与随后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接触、

碰撞、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换句话说,若要考察晚清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就必须从嘉道之际谈起。另外,本书所论地理学,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图学等内容,对地名学和方志学则一般不予涉及。

### 注 释

-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第1分册,第55—56页,科技出版社,1976年。
- [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2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
-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第1分册,第27—28页。
- [4] 战国时期邹衍曾提出裨海说和大九洲的概念,但始终没有受到重视。
- [5] 按:这种“神力”应该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精神。
- [6] 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50页,中华书局,1957年。
- [7] 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52—53页。
- [8] 倭仁:《倭文端公遗集》,卷8,光绪三年(1877年)粤东翰元楼刻本。

# 目 录

序	龚书铎	(1)
导言		(1)
<b>第一章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b>		(1)
一 道咸年间:初步传入		(2)
二 同光年间:系统介绍		(10)
三 光宣年间:理论阐述		(21)
四 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地理学东传		(30)
五 外国“探险家”与近代西方地理学东传		(37)
六 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际遇		(49)
<b>第二章 从传统地理学到近代地理学</b>		(77)
一 嘉道之际传统地理学出现的新趋势		(77)
二 传统地理学的嬗变(一)		(98)
三 传统地理学的嬗变(二)		(115)
四 近代地理学的产生		(129)
<b>第三章 晚清地理学研究与民族救亡</b>		(160)
一 地理学研究与边界谈判		(161)
二 前赴后继的出国考察活动		(172)
三 20世纪初年的乡土地理教育思潮		(181)
<b>第四章 地理学研究与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b>		(198)
一 地理学研究与民主思想的传播		(198)

二 地理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传播·····	(222)
<b>第五章 地理学研究与传统观念的变异(一)</b> ·····	(239)
一 从地方如棋、天运地处到地圆如球、日心地动·····	(240)
二 五大洲说的普及与大九洲说的重新“发现”·····	(258)
三 思想界对风水观念的批判·····	(267)
<b>第六章 地理学研究与传统观念的变异(二)</b> ·····	(289)
一 中国中心观念的动摇·····	(289)
二 夷夏观念的变异·····	(299)
三 时局观与国情观的变异·····	(318)
<b>主要参考书目</b> ·····	(343)
<b>主要中外人名对照索引</b> ·····	(356)
<b>后记</b> ·····	(360)

## 第一章 晚清西方地理学 在中国的传播

- 道光年间：初步传入
- 同光年间：系统介绍
- 光宣年间：理论阐述
- 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地理学东传
- 外国“探险家”与近代西方地理学东传
- 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际遇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过单纯的输入或输出。因此，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始终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不过，相对而言，代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西学较之中学的发展水平为高，因此，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不仅如此，近代西学是伴随着血与火强行闯入文化中国的，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为前所未有的，并很快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晚清西方地理学正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的，并很快与中国传统地理学发生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

如前所述，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并非始自晚

清。早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西方地理学知识便开始东传。后因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加剧,清朝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西方地理学东传的过程基本被中断,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也遭到冷落甚至敌视,以致这一时期过后,中国传统地理学未能汲取其营养,迅速向前发展。

西方地理学的第二次东传,是乾嘉以后的事。大约在1820年前后,西方地理学又卷土重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地理学更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经过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相互接触、吸收、融合,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下面我们从传播渠道、传播主体及其内容等几个方面,根据时间的先后,对当时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一系统考察。

### 一 道咸年间:初步传入

19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加剧,游弋于东南沿海各地的基督教士便开始向中国内地输入西方地理学知识,并且一开始就采取多种渠道齐头并进的方针。一方面,他们在东南沿海各地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马六甲,1815—1821年)、《天下新闻》(马六甲,1828—1829年)、《东西洋每月统计传》(初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1833—1837年)等报刊,登载一些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文章;一方面创办一些学校(如英华书院,马六甲,1818年),招揽旅居南洋的华侨子弟入内学习。到1834年,侨居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出版机构,标榜要“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sup>[1]</sup>。当时这些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此类文化活动不能说毫无意义,他们不仅培养了袁德辉、容闳等接受西学(当然包括西方近代地理学)教育的学生,而且出版了美国公理

会士裨治文编译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有关外国史地的著作，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了解外国地理状况提供了最新资料。但由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东南沿海一带，而且有些活动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因此影响不大。

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建立，西方各国为了扩大其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文化侵略，传教士纷纷在各通商口岸创办报刊，兴办学校，同时将设在东南亚的编译出版机构迁入中国境内。据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主要报刊有《遐迩贯珍》（月刊，香港，1853—1856年）、《中外新报》（宁波，1857—1858年）、《六合丛谈》（月刊，初设于上海，后迁至日本，1857—1858年）。这些报刊登载的文章，除主要介绍宗教、商业等内容外，也介绍了一些包括西方近代地理学在内的科学知识。如《六合丛谈》就曾连载英国伦敦会士慕维廉撰写的《地球大率论》、《地质》、《地理释名》、《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论》、《洋海论》、《潮汐平流论》、《湖河论》、《地气》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收入《西学大成丛书》，取名《地学举要》。

同时，教会学校也先后发展起来。据记载，从1842到1877年底，全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学校，1852年以前，仅江南一带就有七八所，学生1290人。在这些学校中，主要的课程当然是宗教教义，但同时也开设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目，而地理学则几乎是各学校必开之课，如马礼逊学校早在1841年便开设有地文、初等算术课程。<sup>[2]</sup>

1843年从巴达维亚迁入上海的墨海书馆，是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最早设立的有铅印设备的图书编译出版机构，先后由英国伦敦会士麦都思、伟烈亚力负责，王韬和李善兰早年都曾在此工作过。该机构起初只印一些伦敦布道会使用的《圣经》和小册子，后